

ZUOJIA SICHAO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LU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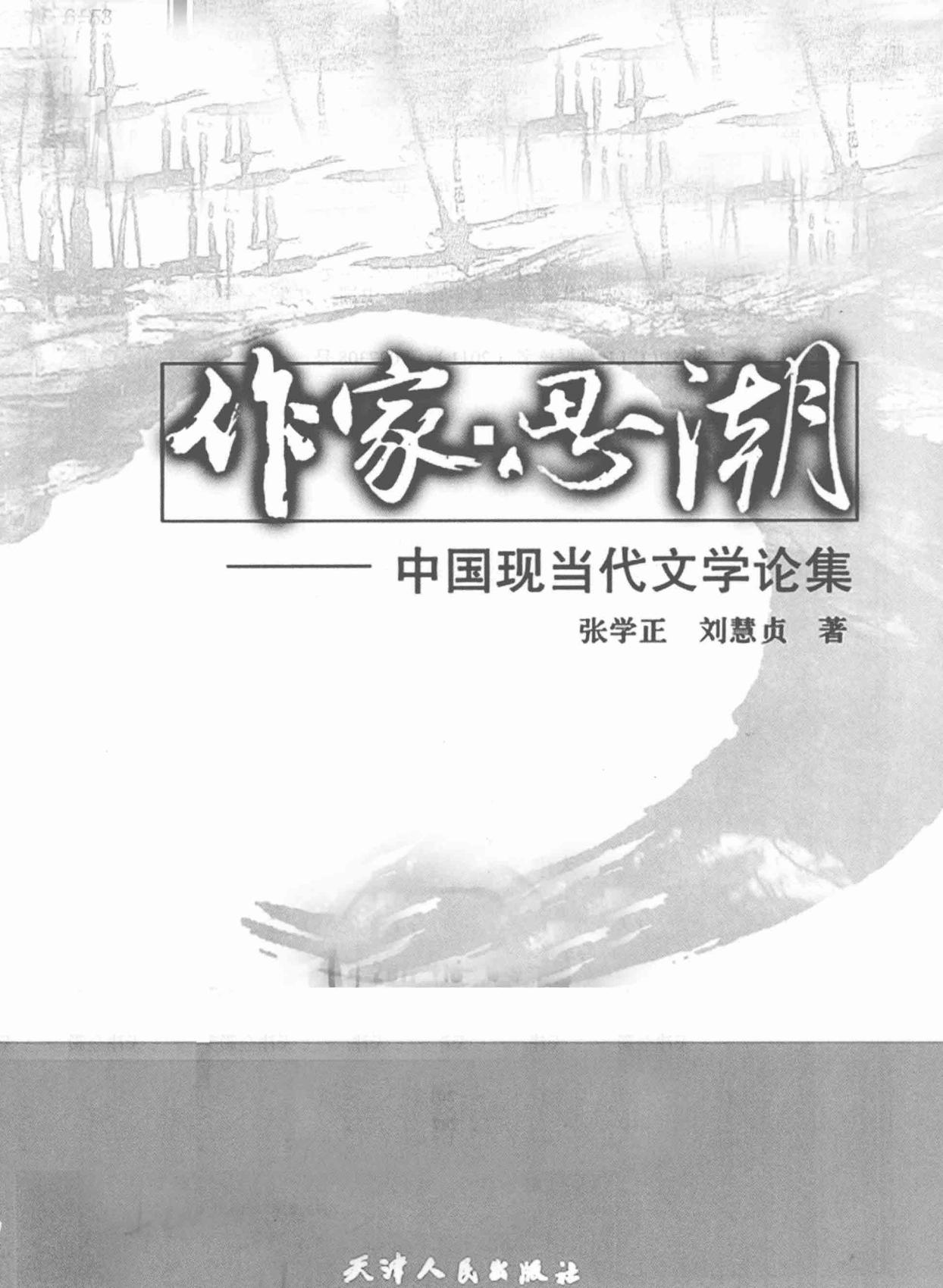
作家·思潮

——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

张学正 刘慧贞 著

迅、冰心、巴金、老舍、孙犁、梁斌、
蒙、张贤亮、白先勇、贾平凹、王安忆
朔、张余华、陈染等的创作个性探微及作
评赏

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家·思潮

——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

张学正 刘慧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作家·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 / 张学正，刘慧
贞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3

ISBN 978-7-201-06951-7

I. ①作… II. ①张… ②刘… III. ①现代文学—文
学评论—中国—文集 ②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1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30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31 印张 2 插页

字数：500 千字

定 价：69.00 元

序

在纪念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 90 周年的时候，选编、出版《作家·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以下简称《论集》）是一个幸运的巧合。《论集》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作品的微观研究；一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的宏观研究。

《论集》的重点部分是我们对巴金、孙犁、王蒙等作家作品的研究。我们欣赏与敬佩这些作家的人格精神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魅力，这就成为我们多年来坚持不懈研究他们的强大内驱力。

作为情感与心灵的艺术，文学应该是真诚的。巴金、孙犁、王蒙等作家的人格与创作的精魂就是真诚。

巴金不止一次地说过：“讲真话，讲自己心里的话。……不说谎，把心交给读者。”（《春蚕》）他还把“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巴金全集》第十八卷代跋）

孙犁曾尖锐地指出：“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奋勇地前进、战斗》）

王蒙坦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是真诚的。没有真诚，就没有文学的动人。”（《文学的歧义》）

作家应该有一颗真诚的心，应该讲真话、抒真情、写真相。真诚的文学，对历史、对人民、对生活、对读者都应当是心地纯正的，真诚无欺的，这样的文学才能撼人心魄并可作为经典传世。

我们喜爱像巴金、孙犁、王蒙等这样一些真诚的作家，于是我们也以一颗真诚的心写下了关于他们的一些文字。文中所言，是我们怀着探索的激情和发现的喜悦写下的心里话。

《论集》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关于现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的研究。

回望“五四”以后至 40 年代的中国，虽然战乱不断，外敌入侵，又有反动政府对左翼文学的围剿，但文学仍能在内忧外患的间隙生存、发展，那是一个思潮迭起、流派林立、文学巨匠与巨著频出的时代。50 年代，随着历史的转折，中国大陆地区文学进入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时代，取得了不少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就。然而，文运与国运一样，也遭遇了连绵的灾祸。虽然也曾有短暂的“百花”期（1956 年至 1957 年上半年）、“调整”期（1961、1962 年），但却是昙花一现。

1966 年至 1976 年，更是十年文化浩劫。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文学迎来了一个伴随着喧哗与骚动的全面恢复与繁荣的新时期，重又出现了创作兴旺、思潮流派纷呈的大好局面。这就是 80 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与 90 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学。

近百年来，特别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 60 年文学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规律：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所贯彻，艺术民主有所体现，创作自由、批评自由有所推进的时候，作家的艺术个性就能得到高度张扬，作家的创作才能与艺术创造潜力就会得到充分释放，文学就会出现“今夜星光灿烂”的动人景象！

邓小平讲得好：“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 年 10 月 30 日）“不要横加干涉”，文艺才有希望。

文学的天性是自由的、多元的。

早在 1842 年，马克思就曾对当时独裁专制的普鲁士政权的《书报检查令》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当权者强制作者“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要遵循官方“指定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愤怒地质问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都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7—9 页）

在精神太阳的照耀下，文学本应“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数千年来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史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文学应该是自由的、多元的。只有文学的自由和多元，才能有文学的主体性和个性，文学的创新与繁荣，才能有真正百花争艳的文学的春天！

《论集》虽区区 60 余万字，但却表达着我们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生态的点滴认知和对未来文学发展的热切期待。

张学正、刘慧贞
2009 年 12 月 31 日于南开园

目 录

序 张学正、刘慧贞

第一辑 巴金研究

人物的真实 历史的真实

——谈巴金《家》中觉新、梅、鸣凤形象的时代特征 3

巴金创作个性探微

——巴金创作心理分析 13

巴金的思想发展和美学追求

——《巴金代表作》序言 25

试论巴金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矛盾心态 38

一泓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水

——论巴金的思想信仰和道德人格 48

巴金和两个哥哥的未了情 58

理念化的爱情话语

——巴金作品中的爱情描写 60

第二辑 孙犁研究

“应该热心地招呼后面跟上来的人”

——谈孙犁同志对青年作者的培养 71

“一部忠实而有分量的作家传记”

——读《孙犁传》 75

真诚：孙犁现实主义文学之魂 80

观夕阳

——晚年孙犁述论 91

寻觅旧梦

——评孙犁晚年的思想与创作 101

2 作家·思潮

说不尽的孙犁

——孙犁研究的回顾与期待	110
孙犁：都市里的田园梦	117
痛定思痛各不同	
——巴金与孙犁晚年创作的比较	119
巴金、孙犁的晚年心态	126
一面不褪色的文学旗帜	
——《孙犁精选集》前言	131
“风云”的另一种色彩	
——谈孙犁抗日小说的艺术个性	141
孙犁与《白洋淀纪事》	145

第三辑 王蒙研究

探索通向心灵的道路

——评王蒙的小说近作	155
创造一个多元化的艺术世界	
——评王蒙的“例外”说	158
跨越世纪	
——《王蒙代表作》(修订本) 前言	166
“理性的从容”	
——论王蒙的理性精神	178
思维的精灵	
——再论思想家王蒙	188

第四辑 鲁迅及其他作家研究

“难于直说”辨

——《野草》艺术风格问题琐谈	201
谈散文诗《野草》及《秋夜》	205
关于《阿Q正传》	212
王朔从文坛匆匆走过	222
生命“黑洞”的探索者	
——王安忆近年小说创作的新拓展	225

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

- 重读《红旗谱》及对当代革命历史、革命战争题材创作的再思考 228
 西京有个水做的娃

——贾平凹“两性化人格”刍议 234

第五辑 文学思潮及流派研究

- 中国当代文学流派综论 241
 论“新写实”文学思潮 253
 在多元文学交融中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嬗变 259
 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思潮扫描 268
 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之命运 277
 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之波 293
 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变异及多元发展 328
 后新时期小说 349

第六辑 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

- 新时期小说人物论 369
 论新时期小说中的“现代人”形象 379
 论文艺创作中的潜意识细节 391
 必须面对全部文学史实
 ——当代文学史料工作中的一个问题 400
 史料意识与学术道德 401
 争鸣的环境、规则与风度
 ——《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1949—1999）》序言 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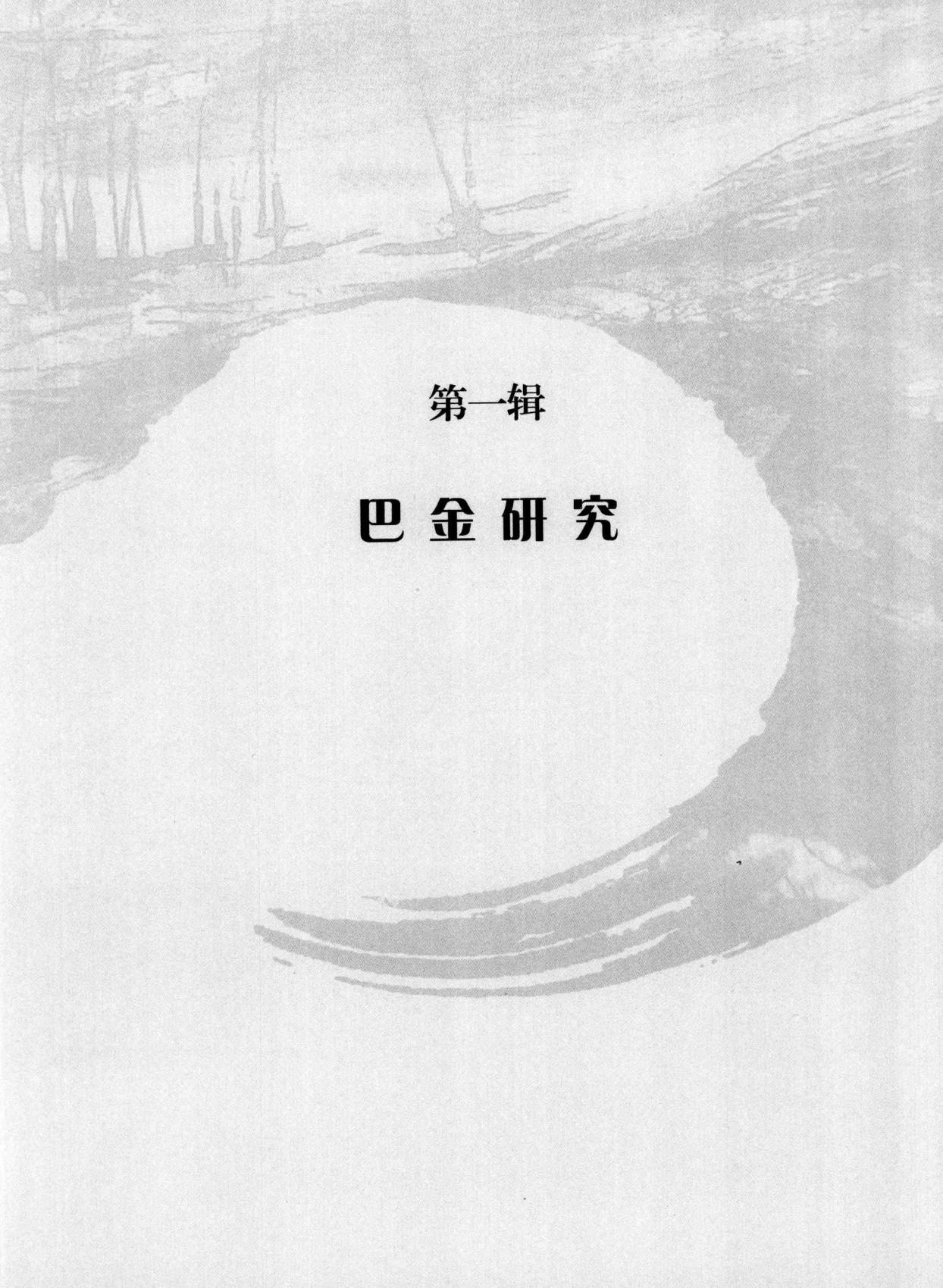
第七辑 作品解读与点评

质朴的真情

- 读《山地回忆》 415
 一幅斑驳绚丽的农村图画
 ——读《铁木前传》 418
 一个冷艳的白色精灵
 ——读《永远的尹雪艳》 420

4 作家·思潮

“无根的一代”	
——读《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423
破译“心灵的密码”	
——读《两代风流》札记	425
活得如此坚韧	
——读《活着》	427
真实而温柔的女性话语	
——读《私生活》	430
爱·生命·永恒	
——读冰心的《往事》(二)	432
温馨的回忆，感伤的叹息	
——简评鲁彦散文《故乡的杨梅》	436
生命·自由·美的协奏	
——《鸟的天堂》赏析	439
诗人的激情，哲人的深邃	
——析《静寂的园子》	442
跋涉者之歌	
——析《撒弃》	444
生之礼赞，死之哀悼	
——析《废园外》	446
一个美好、真诚、善良的灵魂	
——读《远的怀念》	448
“我的衣阿华”	
——读《别衣阿华》	451
得其神韵 锐意创新	
——《骆驼祥子》从小说到银幕	454
心灵的透视与灵魂的重塑	
——《本命年》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	458
爱的失落与追寻	
——《靠窗坐的小女孩》的独特视角和人情美	461
文学档案：是是非非论《废都》	466
附录：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60 年纪事（1949—2009）	477
后记	491



第一辑

巴金研究

人物的真实 历史的真实 *

——谈巴金《家》中觉新、梅、鸣凤形象的时代特征

通过对人物富于时代特征的独特性格和命运的描绘，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金长篇小说《家》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但是从 4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评论界，都曾以“没有写出历史的真实”来否定或低估《家》的艺术真实性，甚至认为“《激流三部曲》和《红楼梦》差不多，20 世纪初年演着与几百年前几乎同样的悲剧，这显然是不真实的”^①。这种观点的偏颇在今天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识，但通过《家》中各种不同类型形象的剖析，去发掘它所反映的中国 20 世纪初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新旧交替的历史真实，却还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家》的主要思想成就在于它特定的反封建的主题。它以一代青年的爱情、婚姻和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崩溃为主要描写对象，发出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强烈呼声。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不乏以爱情、婚姻为题材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的作品，如人们熟悉的《西厢记》、《红楼梦》等。但是和《家》相比，由于它们反映的具体历史时代不同，因此所蕴含的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也不相同。前者更多的是提示青年人自发的个性要求与封建制度、封建传统的矛盾；而后者则表现青年们在自我意识和民主要求处于觉醒或半觉醒状态下，和封建家族、封建礼教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尖锐冲突。后者的角色由于自我意识的开始苏醒，在性格上就呈现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并由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家》里面的高老太爷和觉慧作为新旧两种势力的主要代表，其思想、心理、言行反映出典型的時代特征，早已为许多研究者所论及，而其他众多的人物形象，也都各自以他们独特的思想、性格和命运，反射着时代的光耀。

觉新——光明与黑暗交替时期的产儿

性格的矛盾性，是觉新形象的基本特征。这种矛盾性格的主要内涵乃是几千年封建传统、封建伦理与新的历史时期的民主思想在一个善良而懦弱的灵魂深处的交锋，这交锋反映着 20 世纪初叶的中国腐朽与新生两种力量的搏击。也正是这种交锋与搏击，造

*载《文学研究年刊》(1985)，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年 3 月版。

就了觉新这个既不同于封建家族的孝子贤孙，又不同于旧世界的叛逆者的具有独特性格的时代的产儿。

觉新诞生在清末一个“诗礼传家”的封建官僚大家庭。辛亥革命发生在他的少年时代，使他有幸避免了封建仕途的人生道路而在洋学堂接受了新式的中学教育。

“他对于化学感到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大学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法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许多美丽的幻想。”这种对人生、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支柱，甚至连少年丧母的沉重悲哀都没有在他心上留下过于显著的痕迹，“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前程和他的美妙的幻梦。”此外，他内心还隐埋着另一个美好的心愿，那就是与表妹青梅竹马的爱情得到幸福的归宿。这些由现实生活所唤起的他对事业和爱情的美好理想，正是一种在“五四”前夕民主气息的感染下所萌发的对个性自由发展的憧憬。

不过觉新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却是高氏门第的承重孙的特殊地位，使他被封建家长们视为封建家族当然的接班人。他也就因此比兄弟姐妹们更多地承受了封建教义的熏陶。这给予觉新的最大影响是使他把顺从家长意志、维护大家庭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幼年，觉新就过早地承受了要尽家庭义务的重托，立下了“只要将来做八府巡按，妈也就可以扬眉吐气了”的志向。

觉新就是带着一方面热烈向往个性自由发展，一方面又把维护封建家庭、顺从家长意志视为责任和义务这两种截然相悖的思想观念进入了青年时代。在此之前，生活本身还没有使他感觉到这两种人生追求的对立性。然而，就在他中学刚刚毕业，理想还来不及付诸实践的时候，那“责任和义务”就压上头来。家长们要他成亲，而配偶是照例不容自己选择的。紧接着是要他承继家事，料理家业，履行他承重孙的义务，从而切断了他继续求学深造的途径。直到这时候，两种思想观念支配下的两种人生追求的矛盾性，才开始严峻地、切实地摆到了他的面前。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完成这些“义务”，那些青春的幻梦就将被“残酷地打破”。在这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面前，他最初感到突然和不解，最后，他的责任感、义务感发生了决定性作用，“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头表示愿意顺从父亲的话”。但是，当他回到自己房里时，却又蒙头大哭，痛悼那青春幻梦的破灭。

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观念的搏击，就这样猛烈地冲击着这个“羽毛未丰”的青年人。新旧交替时期的现实生活土壤，就这样培植出了觉新双重人格的根苗。在行动上，他顺从着封建家长的摆布；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他深埋着美丽的、破灭了的幻梦，尝受着青春被压抑的苦果。

如果觉新就照既定的生活轨道走下去，不断地在矛盾痛苦中完成他的家庭义务，他那青春的火焰完全可能被彻底熄灭，忘掉青春的美梦，成为一个标准的、封建家族的孝子贤孙，走他祖、父辈一样的生活道路。那时，他的双重人格也将趋于消除。事实上，他也确实在逐渐适应这种生活了。但历史发展的进程又不允许觉新安

然地重走上一辈的老路。就在他婚后的第三个年头，五四运动以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为旗帜，席卷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五四新文化运动给觉新三兄弟的生活里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时代的新鲜空气。觉新感到“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的被忘却了的青春”，因此，和两个弟弟在一起，他仍然是一个燃烧着青春之火、理解和信服真理的青年。同时他个人事业、婚姻上的不幸与没落家族中人与人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事实，也使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这些都在召唤着他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在调整着、深化着他头脑里对于新旧思想的是非观。这使他在总的思想倾向上和封建家长们有本质的区别。他算不上封建势力的孝子贤孙。对于觉民的抗婚，他从始至终是是非分明的。他“承认觉民的举动是正当的”，为自己未能给觉民任何支持而“不断地受到良心的谴责”。他鼓着最大的勇气去向祖父说情，得知觉民抗婚胜利，他立即变愁苦为惊喜，从内心为觉民庆幸。对捉鬼事件，他知道其荒唐，心里“不赞成这样的做法”。而瑞珏的惨死更使他在遭受重大打击之后“突然明白了……真正夺去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挚爱的两个女人。他现在开始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他想把它甩掉”。这种清醒的认识，可以说是觉新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他终于把个人遭遇与整个制度和礼教联系起来了。这样，他对于最后觉慧的出走，就不但在精神上、道义上给予赞同，而且不顾个人处境的艰难，在物质上、行动上也给予了全力支持。他想的是“我们这个家庭需要一个叛徒”。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早期民主思想的渗透、“五四”时代浪潮的冲击以及切身的遭遇，造成了觉新与“五四”时代的科学民主精神基本相通的思想和气质，使他从思想上、感情上更多地倾向于民主自由的时代潮流。

觉新性格的矛盾性就在于呼吸到民主的时代气息的同时，还有着封建家族伦理观念的精神负累，受着家长专制的束缚。在家长的淫威下，他不得不做出种种违心的事。他思想感情上同情觉民，但又劝他服从命令；他深爱自己的妻子，却又不敢阻拦别人把她推向死路；他知道“捉鬼”的荒唐，但又不得不去捉。“屈从”使他经常处在思想感情和言行相矛盾的痛苦之中。这是觉新的不幸，也是一大批同时代同命运的青年的不幸，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五四运动的风暴使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受到了一次空前的冲击，但仅以一次政治的、思想的运动毕竟不能对旧世界产生摧毁作用，“五四”后，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有相当的优势。在四川成都这个封建官僚世家聚居的地方、在高老太爷统治的家族内，虽然子孙的堕落、倾轧和角逐已使大家庭显露着败象，但传统的礼教和家庭制度也还施展着它扼杀人性、残害青春的余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觉新的悲剧就在于受了两种对立思想的熏陶却又并不真正了解它们。他不了解旧的传统观念那没落阶级意识的反动实质；也不了解新的民主思想所代表的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的趋势。因此他就错误地想从调和中寻

求新旧矛盾冲突的缓和与自己心理上的平静。这种企图就“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

新旧两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土壤，造就了觉新的两重人格。但其中对新旧思想比较明确的是非观和对民主与个性自由的真挚向往，是主要方面，正是这个主要方面决定着他对待封建婚姻、封建迷信这关系着青年一代命运的封建家族的两大精神支柱持否定态度；也正是这一内在因素，决定着他性格发展的趋向——日益看清旧家庭残害青年的罪恶。这其中孕育着觉新走向新生的希望。

自然，对觉新来说，要改变性格的两重性走向新生，也并非轻而易举，也许还要走过一段漫长的人生旅程。这不但因为他生存的年代里，封建势力还有相当大的威力向他施加压迫，迫使他听命于家长的专制，而且也因为他思想中的另一面——“孝”的伦理观念，也束缚着他的行动，使他屈服于家族统治。再加上他懦弱的个性特点，就使他常常被迫扮演着牺牲个人，有时也牺牲亲人的悲剧角色。

觉新的性格中有着严重的“作揖主义”，这是他求得精神解放，走向新生的障碍。但对它的消极作用也不可夸大，仿佛如果他放弃了这种处世哲学，那些屈死的冤魂就可以免除厄运似的。觉新的“作揖主义”的存在，与他性格的懦弱和受“孝”的伦理观念的影响有关，但归根结底是他对历史的进程缺乏认识。他想用“作揖”来调和、回避矛盾，维系大家庭的和平安宁，却不知道这样的家庭已经走到了它自身历史的尽头，任何力量——包括他的自我牺牲——也无法挽回它衰亡的命运。他信服新思想、新理论，却又不能站在历史的、时代的高度理解它，而只是从自我意识、切身利害出发接受它。这种对于新旧两个时代认识上的盲目性，是他“作揖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有的论者认为觉新是“从道理上、口头上接受了某些新思想，而感情上、行动上都留恋旧的家庭”。^②然而在我看来，觉新的感情和行动并不统一，而是尖锐地矛盾着的。从个人感情上，他向往的是那“青春的幻梦”；而对旧家庭口头上、行动上的屈从，倒常常是出于封建教义和家长的约束和压迫。如果不这样认识觉新的思想感情与行动之间的矛盾，那么他的许多痛苦的内心活动，就无法解释。当他一面“不作声，只是点着头”顺从了父亲为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一面却又在自己房里蒙头痛哭的时候，难道不是说明了封建礼教严重地践踏、伤害了他向往自由幸福的美好情感吗？当他为不能帮助觉民实现婚姻自主而自责、愁苦，继而又因斗争胜利而惊喜时，不正反映了他从感情上和新思想的合拍吗？当他面对着那阻隔了他和瑞珏见最后一次面的两扇门，“把拳头拼命地在门上擂”的时候，不正生动地说明了他渴望夺回幸福的愿望和礼教之间的剧烈冲突吗？如果他仅仅是口头上、道理上接受了新思想，那么当新思想遭践踏时，决不会掀起如此强烈的感情的波涛。对觉新来说，接受新思想，倒恰恰是首先以感性的、直觉的共鸣为基础。

也有的论者看到了觉新性格中“健忘”的特点，并联系鲁迅笔下的涓生，指出这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特点，他们不敢正视客观现实，也不敢正视自己，在遗忘中偷生，在遗忘中残喘”。^⑨觉新有了瑞珏，就“在短时期内”“忘记了另一个女郎”；他刚刚还在为梅的不幸命运而极度痛苦，转眼间又加入到弟妹们的欢声笑语当中。这里面不能说没有遗忘偷生的因素，但仅仅如此解释又显得有些简单。对于觉新，我们时刻不能忘的是他的性格的矛盾性、两重性，这是他之所以是觉新而不是涓生的根本点。觉新某些表面看来是健忘的表现，往往反映着他所独具的两重人格的特征。这种两重人格使他能够表里不一，可以在表面的欢笑中暗暗地把眼泪吞下肚去，可以在表面的淡忘中，把记忆深埋进心底。“欢笑”常常是他完成某种义务、应付外界、维持自尊的假面，倒并不一定都意味着对痛苦的忘却。事实上他几乎没有从往事的悲哀中解脱出来过。巴金有一段话，颇有助于我们对觉新这种独特性格的把握：“觉新就是这样的人，他爱面子，他做事要做得‘漂亮’，他不肯输一口气。为了这个他宁愿让自己、让自己所爱的人受苦吃亏。他的眼泪不会少，但却都是吞在肚子里去的。他常常在人前露笑脸，只有关上房门，他才会伤心地哭一两个钟头。”^⑩成长在新旧交替时期，作为大家族的承重孙的觉新的“健忘”有着与“五四”青年涓生所不同的丰富、复杂的内涵。

觉新的矛盾性格，具有很高的典型性。它反映着诞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出身于封建大家庭，深受封建道德伦理的教养，同时在成长过程中又感受到旧民主革命和“五四”时代气息的青年知识分子较普遍的特征。他们生长在新旧交替之际，身上打着两种时代的烙印。由于民主思潮的影响，他们已经开始了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有强烈的个性自由要求；但是封建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又相当严重地限制着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挣扎在两种人生抉择之间：要么与旧家庭一起毁灭，要么冲破精神牢笼，走上新的生活道路。这样的典型在“五四”时期，可以说比觉慧更具有普遍性，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鲜明强烈的新旧交替时代的投影。巴金在《家》里用了最多的笔墨来刻画觉新这个人物，根本用意正在于控诉封建家族制度对青年人的残害，对青春的扼杀，并向当代千千万万个觉新敲响警钟，使他们认清恶势力，认清时代的潮流，也认清自己的弱点和危险处境，从而在彻底变成牺牲品之前，做出明智的抉择。就像巴金在《呈献给一个人》里对死去的大哥所说：“假若你能够活起来，读到我底小说，……你也许会觉悟吧，你也许会决然地来走新的路罢。”

梅——站在光明的门槛外，任人宰割的羔羊

梅，确如有的论者所说，是那种“半新半旧”的女性。她和觉新是姨表兄妹，从当初觉新的父母曾向梅的母亲提亲来看，她的家庭和高家即使够不上门当户对，也当属同

一阶层。她早年丧父，在一个顽固、守旧而缺少对女儿的体察的母亲的管束下长大。妇女本来就是压在封建宗法和礼教的最底层，而在母亲寡居的书香门第中，就有着更严格的束缚。因此，当梅度过了和表哥无忧无虑的青梅竹马时期后，就告别了一切欢乐，套上了礼教的枷锁，一步步走向苦难的深渊。第一个打击就是和表哥的亲事被破坏，嫁到一个自己所不爱的丈夫身边。一年后，第二个打击又降临到头上，她守了寡，被母亲接回娘家，从此恪守节妇之道，不仅再没有青春，连青春的梦也难得再现。她对人生失去了一切希望，只有靠着对往日的回忆消磨残生。最后，在寂寞抑郁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在梅的短暂的一生中，她默默地、无反抗地听任着礼教的摆布，她几乎连心愿也没有透露过。直到死，那些封建家长也不知道梅是被他们一手杀死的。她顺从地嫁出，顺从地守节，她感到痛苦，却又承认只能如此，是“命中注定”。在她身上具备了温良恭顺的传统的封建妇道；她的全部经历，都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在几千年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的悲惨命运。稍有不同的是她并非不知爱情的幸福为何物，她曾经有过青春的美梦，因此也便有着美梦破灭的痛苦。这痛苦由于在寂寞的守旧的家庭里找不到一个知心人得以倾诉，就使她变得抑郁、沉闷和多愁善感。因此，她并不是昏昏噩噩地被宰杀，而是怀着生的苦闷做了礼教的牺牲品。从这一点来看，她确乎很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如果她的全部生活仅止于此，她也就确实在演着几百年前同样的悲剧。

然而事实却是在她生存的年月，“五四”新的时代已经向她显露了幸福之光。大家闺秀的物质生活又使她具有得以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化素养。因此，她身在黑暗里，却能看到、触到光明的门槛。她有机会阅读《新青年》，虽然她并不完全理解那里面的道理，但她承认“懂得的也有。那些议论也有好的，因为我受过害了，所以知道”。这就说明她对自己的命运的悲剧性并非全无理性认识，她看到了自己是受害者。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认识，有着那些旧时代的节妇不可能达到的高度。梅从《新青年》上看到了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就说明她开始找到了受苦的根源。同时，她也亲眼看到了在她周围的同时代人中，就有琴那样向着自由幸福奋进的女性出现，她们已在摆脱礼教的枷锁，在精神上、文化上、爱情上夺取自主权。这些“五四”时代的民主思潮和社会现实给予她的认识和感受，像春风催生一样，召唤着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她看到了争取个人自由幸福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她抑制不住地对琴说：“琴妹，你真值得人羡慕！”所以说，梅既有着封建时代妇女的悲剧命运，但她又不完全属于那个时代，她的精神上已经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尽管烙印还不很鲜明，但她毕竟不同于一个精神完全受缚于封建礼教，不知什么是自我，不知苦从何来的旧式妇女，在她面前已经出现了一条人生的光明之路。

遗憾的是对梅来说，这光明的信息来得太迟了些，她在礼教的深渊里已陷落得太深，几乎失去了改变命运的能力；同时，时代的进程，也还没有为她这样一个守节的女人提供足以改变命运的客观条件。她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在这一点上她比